

导 论

—

生产力保卫与生产力发展是国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防是为了换取国家安全，防止生产力被掠夺并为生产力发展给予和平保障，国防在生产力保卫中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既然国防是必不可少，并且国家不得不时刻追求军事科技的领先地位。那么，国家只有以国防科技为先导，把发展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结合起来，在履行保卫生产力职能的同时，建立起军事技术领先发展，军事技术适时转入民用领域的机制，这是我国实现工业、农业、科技现代化同国防现代化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

从国家的萌芽时代，国防就作为生产力保卫的工具而存在。“部落把某一地区认作自己的狩猎地盘，并用强力保护它们所免受其他部落侵犯……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即用以保卫财产，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0页。）有利益争夺就有战争，战争就是对生产力的争夺，生产力的争夺导致生产力的保卫与科技的发展。

保卫生产力是以巨大的军事消费为前提的，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耗费了208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花了近11170亿美元；1973年的中东战争交战双方厮杀18天就花费了

近100亿美元；军事技术的提高使军事消费出乎意料地增长。而且，巨大的军事消费只有进行国民经济的动员才能保证，实现生产力保卫的职能必须依赖经济结构的应急转轨。而这在更大程度上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利用生产力要素更多地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当战争爆发时，生产力被大量地用于生产军品，战争一旦停息，军事需要减少又要求生产力转入民品生产，如果转轨不顺利，设备被闲置，就意味生产力要素的浪费，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遭受挫折。可见，国防现代化依赖于现实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取决于国防科技的转化。认识这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是我们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与财政分配的关系的关键。

安全需要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人们还有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需要，军事需要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需要，并成为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且，由于安全需要是物质需要的前提，科学技术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再由军工转入民用，展示了军事工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开拓性作用。从铁器代替石器，黑火药的出现，炼铁技术的进步，航海设备的改进，雷达的广泛使用到飞机的出现，核武器的产生，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普及，无不是军事需要推动的结果。

在当代，以军事科技推动经济发展更是世界潮流。“星球大战”计划，“尤里卡计划”，《振兴科学技术大纲》与“人类新科学技术计划”等等当今世界有代表性的超级项目展示了这一前景。在这之前，“曼哈顿计划”，“阿波罗”工程证明了军事科技推动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能量。

军事消费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不仅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先导作用，还表现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军事工业往往是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新的管理方式，协作方式往往最先产生于军事生产之

中。我国近现代的生产力发展，与军事需要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充满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因不断挨打促成了以发展军事工业为特征的洋务运动。虽然它失败了，但洋务运动奠定了我国近代工业的技术基础。在国民党时代，军事工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是突出的，国民政府1925年至1934年发行国内公债22.6亿，其中86%用于军事开支。所借外债总计34亿（可能折算有出入），其中军费占58.88%。这些支出在工业投资中的作用是明显的。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生产力发展，也是军事工业造就了我国现有工业基础。“一五”时期，我国卓有成效的156项重点工程，其中有1/3的项目是投资创建军工企业，“三五”与“四五”时期，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国家用于三线建设的总投资将近2000亿元。

总之，生产力保卫与生产力发展是国防财政的双重职能，没有生产力保卫就没有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生产力保卫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虽然生产力保卫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也存在矛盾，但由于国防安全是人类生存的保障，我们就只有兼顾生产力保卫与生产力发展，借助军事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

二

军事经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冷兵器时代、火器时代以及火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军事经济的研究也展示了鲜明不同的特点。

在原始社会末期，战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也是国家的萌芽与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的军赋是作为最早的国家财政范畴出现的。但在农耕时代，简单的作战武器把军事经济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这时的军事经济完全限于军粮的征集和战场后勤保障。在制造业产生之后，由于工艺不太复

杂，协作水平不高，军事工业的地位仍未突出出来。那么，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仅仅反映为军事需要与国家财政保障的关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各国流行的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单纯财政观。对于军事与财政的关系，古今中外许多至理名言作了精辟的阐述。《孙子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指出了军事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性。商鞅的农战思想指出了农耕时代的国防经济观，“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之，信可以守战也。”（《商君书·农战》）主张以农国防。在资本主义早期，威廉·配第的《赋税论》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国防经济思想。认为国家在和平时期在“国内经常保持戒备状态，乃是避免外国所发动的战争的最省钱的办法。”（威廉·配第：《赋税论》，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提出了威慑性国防的经济观。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不朽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专题研究了国防费，把国防经济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里阐述了国防费负担的必然性、国防费的性质以及国防费增长规律等一系列的命题。

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军事消费不断扩大。与此相适应，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深远影响越来越明显。到拿破仑战争时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经济结构对战争的决定作用。大卫·李嘉图对国防经济的研究更深化了一步，他发现战争与和平交替时，会给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长期的和平以后开始战争或长期的战争以后开始的和平，一般都会在工商业上产生很大的困难，它会大大改变资本以前投入的行业性质，这些资本在新环境使之成为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中稳定下来以前，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期间，很多固定资本得不到使用，也许会完全损失，工人则不能就业。这种困难时期的长短要看大多数人是不是愿意放弃他们长期已经习惯的投资行业。”（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504页。）他已经注意到国防工业军转民与民转军的后果，而这是军费支出引出的国防经济的重要议题。

两次世界大战把军事消费推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时国家只有通过经济的总动员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人们普遍接受了战争的经济决定论而体会到单纯的财政决定论的不足。战时的经济动员与战后的经济转轨成为军事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军事实践使军事经济思想更加丰富。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914年出版了《战争经济学》一书，使之成为第一本军事经济学专著，对经济平战转换中的财政作用以及国防财力论进行了深层次的揭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论》也总结了当时国防与经济关系的一些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凯恩斯的国防财政思想，他的《如何筹措战费》一书探讨了国防财政的一些命题。在我国三、四十年代，也出版了一系列的军事经济与战时财政专著，丰富了国防财政的研究内容。

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冷战”对峙，美国与前苏联在军事领域展开了全面的竞争，军事经济研究成就也较突出。如美国学者查尔斯·J·希奇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施莱辛格的《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肯尼迪的《国防经济学》；前苏联学者波扎罗夫的《国防实力与经济基础》，拉可夫斯基的《战略与经济》等著作广泛地探讨了军事经济规律。另外，英国学者怀内斯《第三世界军费经济学》，日本学者石井洋《日本国防的经济学》，前南斯拉夫学者丘布拉《全民防御的经济学》，以及我国学者出版的一些军事经济学著作丰富了军事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国防经济思想其内容极为丰富。国防财政的起源与发展，暴力以经济为基础的国防财力观，生产力要素对军事消费的决定，军事工业对军事消费的制约，军事消费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以及军费的性质与增长规律，都有系统的精辟阐述。虽然马克思主义国防经济思想极为丰富，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国

防经济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改革实际，深刻解剖我国军事经济运行机制，总结军事经济运行规律的著作还少见。有待我们进行开拓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始终。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力再生产规律、价值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反映了经济运行中的必然趋势，制约着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引导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揭示国防财政规律必须以一般经济规律为指导，继而从国防的角度解剖国民经济与国家财政的运行机理，寻找国防财政规律，以提高国防效率和社会生产力。

以往的国防财政研究，研究战争保障的多，而对发展生产力研究不够；涉及局部的多（只局限于军队的军费分配关系），涉及全局的少（从国家财政管理的全局出发），涉及战斗力要素配置的多，涉及生产力要素配置不够，更谈不上围绕生产力保卫与生产力发展进行研究；理论研究面广，理论深度不够，有的军事经济专著或论文，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移植和基本经济学原理的生硬组合；纯理论研究多，而理论的系统性不强，而且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这都是我们希望有所突破的，为此，本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力求在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指导下，总结实践经验，从继承中求发展、求创新。

关于思路的拓展，（1）力求系统地、全面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经济理论，只有把经典著作中关于经济决定暴力，军事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力要素的进步、生产力要素配置的论述加以全盘了解，对军事消费的性质进行多侧面解剖，才可能在军事经济的研究中避免走极端，而正确地展示军事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2）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出发，立足于国防保卫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双重职能，从生产力要素生成、生产力

要素配置、战斗力要素生成与战斗力要素配置出发，构建军事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对军事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归宿，军事经济运行的政策、机制与体制进行开拓性研究。（3）对军事经济的研究，有必要从军队经费收支的局限中走出来。国防财政不仅仅是一个军费拨款的分配问题，“分配关系和方式表现的只是生产要素的反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页）为了追求军费使用效率最大化，必然研究国民经济与军事经济的关系，探讨基础工业与国防工业、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及军事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并把生产力要素配置与战斗力要素配置的关系理清楚。而且，必须寻求战斗力优化配置规律。这样，才不至于把国防财政研究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看作国民经济的消极方面，而把它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因素。（4）在论文中，紧扣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展开分析，力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我国国防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尽可能地把定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对我国国防经济发展可能性选择作出判断，并提出建设性建议，从而明晰国防经济运行中生产力要素配置关系和战斗力要素配置关系。（5）从要素分配和利益分配入手分析军事经济运行机制与军事经济关系。军工生产与战斗力生成都表现为要素配置（或配置生产力要素或配置战斗力要素），而要素的配置是人进行的，就得充分估计物质利益机制对要素配置的影响（也不能否定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使研究富有成效的保障。在论文中，研究方法的运用是重要的。（1）重视国际比较方法的运用。对条件相同或相似的防务负担加以类比，从中探索防务负担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判断合理的防务负担水平。论文中对1976年70多个国家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与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比较，对印度、韩国、台湾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重点分析，

以求明晰防务负担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关系。以对比分析我国的合理国防费规模。(2) 重视事物之间质的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把不同质的现象加以类比是常见的毛病。军事经济运行中由于军事战略不同而使军事需求的变化呈现很大差异，一律用线性回归也违背了数学原理。在分析经济发展中的军事影响时，防务负担只是一个因素，如果我们不注重可比性，势必影响结论的科学性。(3) 把理论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在经济理论研究中，逻辑推理是重要的，也应该把经济的最佳运行轨迹展示出来。理想的经济运行轨迹应该怎么样？以历史的或现实的数据为依据，可能的运行轨迹又怎么样？两者是不同的。规范分析以确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实证分析以界定事物变化的可能，只有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互补充，相互对比，才可能追求需要与可能的统一。在现实经济分析中，割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现象是常见的，有的人把现实中的一切现象都作为规律，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不分析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往往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同样，军事经济研究中注重实证分析的科学性，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统一起来，同样十分重要。(4) 注重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在分析国民经济结构形成中的军事影响时，在分析军费结构优化时，都需要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抛开总量的结构分析和忽视结构的总量分析都是不完全的。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用总量分析代替结构分析的倾向只能得出有害的结论，例如我们不能凭凯恩斯弹性财政政策而作出因市场疲软增加军费开支，当经济过热就缩减军费开支的结论，必须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结构分析，从协调经济关系出发，以引导经济结构的协调为目的来确定政策。

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国防的经济影响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幻灭了，人们普遍认为过份地军备竞争是前苏联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同样过份的军备竞争却没有衰落呢？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世界确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资本主义社会尚能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呢？回答这一问题就得分析军事经济运行的特殊矛盾，不从军事经济运行的特殊矛盾出发，不认识其矛盾的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苏联的剧变与最终解体是当代震动世界的，引人深思的大事件。苏东政治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体现，根本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关系。长期以来，单纯的强化军事工业而始终忽视军民结合使经济结构畸形化，因为人类历史的战争与和平交替规律决定了军民结合的重要性，违反了这一规律势必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战争时期突出军事工业是完全正确的，在二战之前如没有苏联军事科技与军事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打败希特勒法西斯，赢得世界大战的胜利。二战结束后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相当和缓的阶段，这是规律。但是，苏联经济长期仍然行进在军工生产的单轨上，没有及时开发、生产民品。在和平时期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从50年代到80年代始终没有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战略，因而经济终于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在八十年代后期，仍然把机器制造业等行业作为整个工作重点，而长期以来明显不适应需要的轻工业和农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虽然表面上也提出了发展食品消费品生产，实际上仍未从重工业为主的单一观念中摆脱出来。1989年经济滑向危机，而从85年到88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率分别为3.9%、5.3%、3.8%、3.5%，但生产资料的增长实际仍然是军品的增长。而在同时消费资料的增长仅分别为4.1%、

3.9%、4.2%、5%，军品生产的单一化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因此，社会再生产发展障碍使经济必然陷入危机。并从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

前苏联的危机说明，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理解不够全面，对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须以经济结构协调平衡为前提，国防工业必须坚持军民结合，以军带民，以民养军。国防工业与整个工业必须保持合比例发展。看不到国防财政运行中的特殊矛盾以及矛盾的特殊性，就难以保证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评价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国防影响，因为国防建设走过弯路就全盘否定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国防影响是极为错误的。对于有人主张尽可能地弱化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国防影响，针对片面强调重工业导致的结构失衡，便否定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甚至主张消费资料的优先增长，看不到国民经济轻型化、低档化的后果，是极危险的。

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防的强大，都要求国民经济发展中合比例、有计划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生产力要素的均衡分布。人们欣赏日本的经济起飞，却看不到其经济发展中军事工业的推动作用。美国要把日本建成补给基地，给予了大量的无偿和有偿投资及技术输出，促成了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构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契机，尤其是朝鲜战争的军品定货，奠定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就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形成而言，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导致的巨大的国防压力与薄弱的工业基础，“一五”时期进行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线的投资建设，改变了经济结构，增强了综合国力。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国进一步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严峻的国际局势是三线建设的直接导因。三线建设的具体安排上是有错误的，如“山、散、洞。”但主流应该肯定，因为三线建设与我国宏观工业布局的合理化方向在总体上是

一致的。三线建设的产业重点与三线地区的资源优势相吻合；三线建设在我国矿产、水能、水资源最为富集的中西部地区建设起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三线建设在我国国土纵深地带建立起了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带动了我国内陆地区尤其是一些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防御令人回味，面对美军“地毯式”的轰炸，充分地体现了生产力纵深布局的必要性，说明生产力布局不能不遵循国防原则，把生产力要素在不同战略区域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纵深分布是国防的要求。当然，三线建设也有许多教训，人们通常认为三线建设是用战争规律代替经济规律，实际上它既违反经济规律也违反了战争规律，军民结合才符合经济规律与战争规律的要求。重安全保密而不计成本，强调纵深布局而忽视分工协作，产业结构不合理，军工与民用分割，背离了军民结合，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效率受到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把三线建设的大方向与三线建设中“山、散、洞”区别开来，“山、散、洞”考虑的只是战时个别方面的要求，它委实是小生产意识的反映，因为战时军工生产也要求分工协作。我国改革的新形势下，总结经验教训是重要的，但有的同志盲目否定一切，全面否定三线建设，简单地强调梯度推进（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是不可能的），忽视生产力布局的国防要求是不对的。不实事求是，就会造成认识上的迷茫，影响实际中的决策，不利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军工产业的高级化和利用军工生产力开发民品。自然，也不可否认，三线建设在一定时期，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工业过重，这个教训是应该接受的。然而，这不能作为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由。

重工业过重是忽视综合平衡的结果，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服从于轻重工业的协调，它是轻重工业协调运动中呈现的一种趋势，而不是总是优先考虑投资重工业，它不排斥重工业协调要求的特定时期的对重工业的相对抑制和对轻工业的重点扶持。主张用消

费资料优先增长代替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一种错误的倾向性观点。必须强调，针对对轻工业的长期忽视而对轻工业重点扶持以求得轻重工业的协调不能视为消费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消费固然是目的，需求是市场的导向，目的与达到目的的过程是不同的，满足消费需求决定了消费资料生产与生产消费资料的装备成比例的增长，并且首先要有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手段，如用目标代替目标实现过程，而盲目推崇消费资料的优先增长。不重视生产消费资料装备的投资，就只能是无后劲的经济增长。通常情况下，消费品生产投资的较小规模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的较大规模决定了投资条件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缺陷时，无不把基础设施的投资障碍列举其中。凯恩斯革命导致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广泛介入到生产资料的投资以及公共品生产的投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忽视重工业的产业结构轻型化态势在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很难扭转。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历史上形成的单纯服务于军工的重工业过重的国民经济结构，轻重工业协调水平提高。同时，党和政府从国际形势出发，针对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对世界大战的限制，科学地预见到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格局有利于进行和平建设的可能性（并不排除局部战争的产生）。为了支持经济建设，控制了军费的增长，军费从1978年167.8亿增加到1992年的370亿，同期的零售物价总指数增长一倍多，军费实际上没有增长。这些措施，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不过，经济生活中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也带来了经济结构轻型化隐患，军费的过分压缩导致的军事工业的萎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结构的轻型化趋势。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也由1978年的1:1.32变为1990年的1:1.02，这种变化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在总体上反映了经济结构轻型化趋势。基础工业、交通运

输、能源已处于滞后的状况，必将影响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保持重工业一定的比例体现了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它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平衡的前提。在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思路后，高涨的投资热情再一次衬托了基础工业的弱点，我国交通运输（尤其的铁路运输）紧张空前，钢材等生产资料价格显著上扬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轻重工业协调要求。可见，为了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都得防止国民经济的轻型化。

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经济发展原因何在？究竟是社会制度的原因，还是军事科技在战后释放的能量，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因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军备竞争促进军事科技的飞速进步，这种军事科技力在战后被开发用于民用生产，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几十年繁荣。统计数字大致可以体现这一趋势，在经历了战后军工生产向和平转轨的阵痛期后，五十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超过了7.5%，六十年代的前五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仍高达5%，后五年降到3.4%而整个七十年代更是仅有2.9%。就产业结构而言，汽车工业、飞机工业一直是战后美国制造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钢铁工业虽然在70年代逐渐丧失优势，但在战后的15年在世界市场一直很有优势，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在战后一直飞速发展。另外，“曼哈顿计划”对核能运用的成功，“阿波罗计划”的成就，美国东南部“阳光地带”的掘起，都充分说明经济发展速度与军事科技的内在联系。同样，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积累的军事科技力导致了其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而我国跨入社会主义大门之时的薄弱军事工业基础所奠定微弱的军事科技力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有这些西方国家这样的机遇。对军事科技的辐射作用是应该指出的，这有助于我们寻找增强我国综合力的方法，并坚定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军事工业的军民结合无疑是军事经济研究的热点。是和平时

期就单纯强调军转民，应急之时再强调民转军？还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又如何确保军民结合与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是否就是单纯的军转民呢？这是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解决的问题。应该指出，军事工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分割在和平时期不利于利用军工生产力，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应急转轨，如果不是一贯走亦军亦民的军民结合之路，在和平时期就强调军转民，战时强调民转军，必然会付出经济转轨的巨大代价。实现军工生产的军民结合，就得按行业特征规定军品生产和行业生产能力的联系，建立军事经济的应急动员体制和利用军工生产力的民品开发指导体制。

值得指出，军民结合不是片面的军转民，也包括军事工业的上档次、上水平，军工产业的高级化，保持合理规模的专业军工。军民结合首先就是确立以国防科技为先导，国防科技转民用的以军带民，以民养军的运行机制。国防科技是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也是民用工业的动力。1985年国家科委公布的113项发明奖中，军工系统的成果占53.3%，其中46.7%是军工部门独立完成的，反映了国防科技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的潜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国防现代化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的开拓性以及国家注重以军带民的必要性。

显然，和平时期的军民结合是国民经济的“小军工、大动员”，军工企业需要建立军民两用生产线，在军品定货量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军工生产线开发民品，并适当储备军工生产线。企业在需求变动时（军品和民品的需求都可能增加与减少）方能应付自如。美国最大的二十五家国防承包厂商1975年的军火销售额仅占其总营业额的10%，作为第五号军火承包商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军火销售额在1989年仅占总收入的4%。我国的军工企业长期以来是单纯的军品生产企业，而且军工与民用生产分割，经过多年的民品开发，1985年军工企业民品产值仅占军工企业总产值的

43% ,到 1992 年底也仅占 60% 多一点。显示了我国军民结合的差距。在完成国防定货的前提下,军工企业学会两套本领是提高军工企业效率,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加强国防现代化的要求。这样,军工企业就可以及时地把军事技术开发转入民用,从而及时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搞活大中型企业是当前是热门话题,而大中型企业中军工企业居多。无疑 军工企业搞活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重头戏。那么 军工企业搞活的障碍是什么?怎样为军工企业搞活创造条件?如何转换军工企业的运行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都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自然,亦军亦民,军品民品生产兼顾是必由之路。然而,仅局限于此是不够的,军工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军品价格的理顺,军事科技工作体系的构建都是影响企业活力的因素。为此,探讨军品价格的改革,军代表驻厂制的完善以及军工企业的管理就成为我们国防经济问题研究不能忽视的领域。这些特殊的矛盾以及矛盾的特殊性都关系到军费使用的节约,关系到国家财政为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的制订。

海湾战争作为当代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能给我们许多启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湾地区实施的“沙漠风暴”行动有力地展示了高科技的威力,多国部队强大的空中优势以及高命中率攻击给了伊拉克军事设施毁灭性的破坏,很快把伊军赶出科威特,爱国者导弹更是大显神威。结果,伊拉克企图以手榴弹定胜负的局面没有出现。世界普遍感到:作战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使我们对于军事实力与军事潜力的关系的认识也深化了一步,没有相匹配的军事实力,军事潜力就难以发挥或不能发挥作用,面对海湾战争,必须增强国防现代化的紧迫感。增强作战对抗能力,建立有效的防空体系,没有科学技术的应用不行,没有财政的扶持不行,海湾战争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国防财政政策。结合我国的实际,军费不足,国防工

业过份萎缩的状况有待改观。

财政的军费拨款不仅是军事经济运动的原动力。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运行。军事经济的活力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军费支出的规模与军费运用的机制。社会的经济发展又要求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因此，怎样的军费规模才是合理的？如何达到军费结构的最优化，以有限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战斗力？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明确而正确的回答。

确定合理的军费规模既有难度又十分重要，在通常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其防务水平已足够确保国家安全，而国防投资不足导致国家安全被损害则会产生可怕后果。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又要求国家尽可能地节省防务开支从而使经济发展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双重的资金需要决定了国防经费供给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确定国家安全的起码需要，保持军费的适度增长。确定国家安全的起码需要是可能的，这一合理需求决定于国家的领土、领海与领空的多少；决定于周边环境（陆上与海上）的安宁程度；决定于特定时期特有的装备水平和军费分配的优化水平（结构是否合理）以及军队的后勤管理水平。

军费结构的优化是军费使用高效率的保障。军费结构的优化体现在军费的有机构成中，它是由军费的技术构成决定的，军费的技术构成表现为装备与人员的比例，首先它体现为微观的战斗力要素的配置比例（一种具体的装备配备具体数量的人员）。其次，从宏观上看，不同场合战斗力水平的生成要求决定战斗力要素的配置比例（不同技术层次的装备总额与配备人员总量之比）。在军费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军费的有机构成决定特定的军费优化结构，而由于军费技术构成的复杂性与军费有机构成的可变性，决定了军费结构优化的艰巨性。军费结构优化是一个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并存的动态过程，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气氛中，增量调

整的局限（因为军费增加极为有限）要求我们更多地侧重于调整存量来达到质量建军的目的。

军队财务是军费使用管理的基础。虽然军队财务在军队实际工作中地位突出，而遗憾的是大量军事经济著作中却没有研究这一内容。而军费预算的科学化，经费管理的条理化，财务制度规范化关系到军费使用的效率，战斗力要素配置的质量。而且，军队财务管理中，经费分配使用的财务关系与生产经营的财务关系交错，财务部门与物资部门的责权关系交错，资金运动与物资运动交错，战斗力要素配置关系与利益机制相关联。为了节约使用军费，有必要对上述一系列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后备与国防后备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为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防的应急需要，必须保持合理规模的后备。海湾战争又一次显示了后备的重要性，伊拉克几乎是单一的石油经济，由于受到经济制裁和封锁，石油的生产受阻，石油贸易无法进行，在国外的100多亿美元的外汇存款被冻结，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对伊拉克实施严密的封锁达五个月之久，伊拉克承受了这一考验，而且继续备战。这充分显示了国防后备的意义。战争前十年间，伊拉克投资500多亿美元购买了武器装备，扩充了战略物资储备。足够的战略物资储备构建了较厚实的国防财政。战略物资不仅满足军事需要，也满足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需要。因此，社会产品分配之前必须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0页。）战略物资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周转方式必须与社会再生产需要和国防需要相适应。国防后备所反映的特殊矛盾与矛盾的特殊性有待我们的国防财政研究加以探讨。

研究国防经济运动的特殊矛盾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是时代赋予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存在霸权主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各国人民在觉醒，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最大的帝国